

文史

一九九九年第四輯 總第四十九輯

W E N S H I

- | | |
|--------------------------|-----|
| 《尚書》歷代解釋選錄和補充 | 顧頡剛 |
| 釋“畚田” | 高光晶 |
| 《左傳》無經之傳考 | 趙伯雄 |
| 唐代洛陽至太原驛路再考 | 王文楚 |
| 宋代官員公費用餐制度初探 | 朱瑞熙 |
| 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彙證與契丹人的南遷 | 周清澍 |
| 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偶 | |
| 《古文尚書》流行北朝時間 | 曹道衡 |
| 談《文心雕龍》的《風骨》、《通變》 | 王運熙 |
| 西夏文學史料說略 | 聶鴻音 |

中華書局

編委會名單

主編 宋一夫

編委(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莘芳	袁行霈	陳金生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可	閻步克	龔書鐸	汪聖鐸	

責任編輯:張耕 汪聖鐸

文史

第四十九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0印張·375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30.00元

ISBN 7-101-02190-5/K·942

目 錄

《尚書》歷代解釋選錄和補充(上)	顧頡剛遺著(1)
釋“魯田”	高光晶(15)
《左傳》無經之傳考	趙伯雄(23)
《孝經》作者與成書年代考	張 濤(41)
由梁元帝著述書目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四部分類體系	
——兼論卷軸時代卷與帙的關係	辛德勇(51)
敦煌本《佛說父母恩重經》研究	張涌泉(65)
先秦諱禮析論	虞萬里(87)
唐季“大秦穆護祿”考(下)	林悟殊(101)
唐代洛陽至太原驛路再考	王文楚(113)
述論密宗在江南的流傳	嚴耀中(125)
宋代官員公費用餐制度初探	朱瑞熙(137)
宋代安撫使制度(下)	李昌憲(155)
金代捺鉢研究(上)	劉浦江(169)
“蒲鮮萬奴有異志”辯析	
——《金史·梁持勝傳》糾誤	劉長海(181)
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彙證與契丹人的南遷(上)	周清澍(191)
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述論	
——兼與方志遠先生商榷	田 澍(203)

《詩經·二南》詩與房中樂關係考·····	周延良(221)
《〈世說新語〉校箋》臆札·····	蔣宗許(229)
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時間·····	曹道衡(245)
談《文心雕龍》的《風骨》、《通變》·····	王運熙(249)
天津藝博館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上)·····	羅國威(255)
讀夢窗詞札記(續)·····	鍾振振(273)
西夏文學史料說略(下)·····	聶鴻音(283)
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	歐陽光(291)

讀
書
劄
記

夏代三康·····	王樹民(305)
西周王朝的開國頌詞·····	王宗石(307)
曆算疏證曆意校勘一例·····	劉操南(310)
白居易《琵琶行》“冰下灘”新證·····	景凱旋(312)
《高僧傳》校點獻疑(一)·····	董志翹(22)
《高僧傳》校點獻疑(二)·····	董志翹(40)
《高僧傳》校點獻疑(三)·····	董志翹(50)
《高僧傳》校點獻疑(四)·····	董志翹(64)
《高僧傳》校點獻疑(五)·····	董志翹(154)
《高僧傳》校點獻疑(六)·····	董志翹(180)
《高僧傳》校點獻疑(七)·····	董志翹(202)
《高僧傳》校點獻疑(八)·····	董志翹(244)
《南史》時誤補校(上)·····	牛繼清 張林祥(254)
《南史》時誤補校(中)·····	牛繼清 張林祥(272)
《南史》時誤補校(下)·····	牛繼清 張林祥(304)

CONTENTS

1. Selected explanations and supplements in various times to the *Shang shu* (*Ancient documents*)
(Part I) *Gu jie gang*
2. Notes on *Xietian* (the Xie field system) *Gao Guangjing*
3. The commentaries without their commentated texts in the *Zuo zhuan* *Zhao Buoxong*
4. The author and the dating of the *Xiao jing* (*Book of filial piety*) *Zhang Tao*
5. The four parts book classification system seen from the list of the works by the Emperor Yuan of the
Liang *Xin Deyiong*
6. *Sutra of the benevolence of parents spoken by the Buddha*: A Dunhuang manuscript
..... *Zhang Yongquan*
7. The taboo in rituals in the pre-Qin time *Yu Wanli*
8. The Zoroastrian Mogu of Daqin in the late Tang (Part II) *Lin Wushu*
9. Further remarks on the post road from Luoyang to Taiyuan during the Tang *Wang Wenchu*
10. Esoteric Buddhism and its spreading in South China *Yan Yaozhong*
11. The official's meals paid by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Song: A preliminary study ... *Zhu Raixi*
12. The Anfushi System during the Song (Part III) *Li Changxian*
13. A study of Nabo (Places of the emperors' inspection) during the jin (Part I) *Liu Pujang*
14. Was Puxian Wannu being disloyal: A correction on the *biography of Liang Chishe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Jin *Liu Changhai*
15. The history of Yelu family in Henzhou and the immigration of Khitan to the South (Part I)
..... *Zhou Qingshu*
16. The abolishment of the system to appoint eunuch the head of garrison army in the early reign of
Jiaqing of the Ming *Tian Shu*
17. The poems of *Zhounan* and *Zhaonan* in the *Shijing* (*Book of Song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court music *Zhou Yangliang*
18. Remarks on the *Annotated Shishuo xinyu*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 *Jiang Zongxu*

19. Jia Daizong's *Dagou fu* (*Prosody of the big dog*)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forged old texts of the *Shang shu* (*Ancient document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Cao Daoheng
 20. The chapters *Fenggu* and *Tongbian* of the *Wenxin diaolong* (*Dragon carving of the heart of literature*) Wang Yunxi
 21.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Wenxuan* (*Selected fine literature*): A Dunhuang manuscript kept in the Tianjin Art Museum (Part I) Luo Guowei
 22. Notes on the *Cis of Mengchuang* (continued) Zhong Zhenzhen
 23.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angut literature (Part II) Nie Hongyin
 24. The tradition of the writers group in Wuzhou during the Yuan Ou Yangguang
 25. Miscellaneous research notes Wang Shumin, Wang Zongshi Liu Caonan, Jing kaixuan
- (Translated by B. W)

尚書歷代解釋選錄和補充(上)

顧頡剛遺著

一、古代中國東西方語言的歧異及其同化

《尚書》，從東周以下的人們看來，無疑是絕大部分用了古代的語言寫成的，它的文格、語法、語彙、字體等等都已和當代流行的很不一致，所以那時人已把它當作“古文”看待。尤其是春秋、戰國之際，文化中心建立在東方的濟水流域，即齊、魯、鄒一帶，而西周時代史官所記錄的若干篇誥辭則是周王室的君臣們用了西方的語言講出來和記下來的，爲了那時的經濟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力量分散，雖在一個武力強盛的王朝壓制之下，還不能達到真正的一統，因此，由於民族不同，交通不便，西方的語言就很不同於東方。固然東方的統治者也多爲周王室所分封，但這些由西方分出來的統治集團，人數究竟稀少，在語言上就很容易爲東方民族所同化，所以那時東、西方的語言在古漢語裏幾乎成爲對峙的兩派。自從周平王遷都洛邑之後，周王室的語言也漸漸被東方所同化（看《左傳》所載周人語言和文告可知）。就是西方的語言，也因執掌關中政權的嬴秦之族本爲東方土著而漸漸地同化於東方。爲了這個緣故，這十幾篇誥辭竟成爲僵死的文字。那時既找不到別的資料可供比較研究，就是飽讀古書的人也很難作出確實可信的解釋。

二、古代西方語言中的語助詞和倒裝句

我們試舉出幾個例子。其一，西方語言中很多語助詞，爲東方所沒有。即如這篇《大誥》，其中的“大”啊，“誕”啊，“唯”啊，“允”啊，“無”啊，“義”（金文作“叡”）啊，“率”啊，以至“洪惟”（金文作“弘唯”）啊，都是語助詞或發聲詞，雖也有音、有字，可是並沒有實際的意義可講。從前的經師們不知道，定要一字一字地講着，那“大”固然可以講作“大大的”，“義”也不妨講作“在道理上應該這樣”，可是那“無”字却是否定詞，《大誥》的“無毖于恤”雖然勉強可以講作邦君、御事們安慰周公，勸他“不要勞于憂慮”，然而語氣已和下文的“不可不成乃文考圖功”發生抵觸，至於《詩·大雅·文王》的“王之蓋臣，無念爾祖”，難道在那極度崇拜祖先神靈的空

氣裏，隆重祭祀文王的時候，竟敢公開地唱出“周王的忠愛的臣子們，你們不要去想念祖宗”這樣大逆不道的詩句嗎？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們就祇該說這“無”字是在一句肯定的話裏（“毖于恤”、“念爾祖”）僅僅起着發聲的作用，它是沒有什麼意義可以推求的語助詞。這種詞例，在東方的語言中是少有的（東方也有發聲詞），如《周禮》這書，現在多數學者指出是齊國人的著作，其《秋官·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故書曰‘夷使’，……‘夷’發聲”。楚本東方民族，《離騷》：“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章句》：“‘羌’，楚人語助詞也”，洪興祖《補注》：“‘羌’，楚人發語端也”。皆其例（但東方的發聲詞遠少於西方則是一個很清楚的事實）。因為我們讀慣的經書和子書大量出於東方作家的手筆，所以我們就很不容易讀懂這些特殊的西方語法。其二，西方語言中很多倒裝的句子。《大誥》的“民獻有十夫予翼”，“予翼”實際上是“翼予”，是說“這十夫來幫助我”，可是它卻把賓詞置前，他動詞置後。又如“不叩（我）自恤”，“不叩”實即“叩不”，是說“我不自憂”，可是它卻把副詞置前，主詞置後。在《酒誥》中，“我民迪小子”，“小子”是周的同姓，屬於統治集團，“我民”則指被統治的人民，“迪”是牖導的意思，本義原是“小子迪我民”，它卻把主詞和賓詞倒轉了過來。又如《多士》中，“罔不配天其澤”，即是“其澤罔不配天”；“惟爾王家我適”，即是“惟爾適我王家”。這種倒裝的語法，在東方人看來是怪別扭的。固然東方人也未嘗絕對沒有這類的話，即如《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說的‘莫知子’，副詞和動詞在前，賓詞在後，合於東方的傳統語法；可是孔子說的“莫我知”則是副詞在前，賓詞居中，動詞在後，和《大誥》的“不叩自恤”類似，竟是西方的語法。這因到了孔子的時候，東、西方的經濟聯繫加強了，不同的文化漸趨於混合，所以東方人也會接受一鱗片爪的西方話，近來有些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說：周是羌族的一個分支，他們的語言屬於藏緬語系。這方面的研究，近年方在開頭，還沒有達到可以利用他們的工作成果來解釋《尚書》的語法的階段，我們祇有安心地等待。將來必有這麼一天，西方的語法整理出來了，《尚書》的文字可以順條順理地講解，不再需要作猜謎式的注釋了，於是這部從古以來被認為“詰屈聱牙”的“天書”就會完全失去了它的神秘！

三、古籍中假借字、歧義字和誤寫字的糾纏

在別的方面，尚書中還留遺給我們許多困難問題，不過這是在東、西方的古書裏一般地具有的。其一，古人寫字沒有規範化，隨便寫同音字，從前人原諒他們，稱作“假借字”，我們對他們不客氣，則直可呼為“錯別字”。在《大誥》這一篇裏，爲了把“誓”字寫作“逝”，於是“若昔朕其逝”一句便將周公的話語變成了他的行動。又爲了把“匪”（非）字寫作“斐”，而斐有

“輔”訓，把“不”字寫作“丕”，而丕有“大”訓（都見《爾雅》），於是“天棐忱”和“爾丕克遠省”兩句，都在經師的解釋之下，從否定的句子變成了肯定的句子，意義恰恰倒轉了過來。其二，古人語中多單音節的字，少雙音節的詞，又因字少，一字數用，這就使得句義搖擺不定，任何解釋者都不容易得到確實的把握。例如“辟”字有致法、避開等訓，於是《金縢》中的“我之弗辟”一語，從第一義講來是周公急遽地要到東方去負責平定叛亂（《說文》及《偽孔傳》），而從第二義講則是周公爲了害怕流言，想逃避到別處去息謠（《墨子》及鄭玄），態度的積極和消極迥然不同。又如“復”有報命、復職等訓，“辟”義爲君主，於是《洛誥》中“朕復子明辟”一句話，從第一義講是周公營造洛邑後向他的主子成王回報（王安石），而從第二義講乃是周公攝政了一段時期之後向成王交還政權，請成王復位（王莽）。爲了古史資料的缺乏，這些歧義不但干擾了經義，而且造成了古代史實的淆亂，甚至在封建社會裏引起了統治集團的混戰。其三，古人原沒有寫錯，祇是秦漢間人識不得古字，以致經過了轉寫就成爲訛文。例如古文的“文”字，中間有一“心”字作“𠄎”，後人鈔寫時錯看作“寧”字，就以訛傳訛地傳下來了。在《大誥》裏，“寧王”、“寧考”、“寧人”、“前寧人”這類字樣特別多，解經者又據了這訛文，認爲“寧王”是受命的王，即文王，又說“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鄭玄）；一說“寧王”是安天下的王，即武王（蘇軾）；“寧人”則是武王的大臣（蔡沈）。自從有了金文和經典的雙重資料比較研究之後，方始知道“寧王”即文王，“寧人”即文人，而“文人”乃是對於祖宗的通稱，本不指大臣們。於是那位民族主義者顧絳，在明亡之後以恢復故國爲己任，改名爲“炎武”，字爲“寧人”，表示他想在中興大業裏做一個名臣的，料想不到他竟受了蔡沈的主觀主義的蒙蔽，天真地使用了這個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經義！

此外，還有缺字、衍字、錯簡、脫簡等等問題，有的容易看出來，有的還得不到具體的證明，無從檢舉，在這些地方都造成了解釋上的困難，這裏不一一具說了。

四、包圍古典的聖道幻想

再有一個聖道問題也是最有可能使人們發生幻想的。從前統治階級之所以竭力提倡讀經，爲的要使人們在經書裏追求聖人的大道理，來衛護封建秩序，便於他們的統治，因此不管事實上合適不合適，總要借題發揮，把聖人之道貫串着全經。即如“大誥”這個篇名，在事實上祇是摘取了篇首二字，而“大”又是一個語助詞，那麼這個題目正同《論語》的《學而》一樣，絕對沒有什麼意義可言。然而偽孔傳却說是“陳大道以誥天下”，顯得這篇書裏貫穿着“大道”一條紅綫。把這個意思發揮得透闢的是一位宋人，他說：“以新造之周而三監叛，則其事大矣。應天順人以征姦慝而寧區夏，則其義大矣。命之曰‘大誥’，其意蓋出於此”（林之奇

《全解》引薛氏語，檢薛季宣書無此文，未詳爲誰）。這就用了說教的態度講出了《大誥》一名的微言大義。然而我們在明確認識了周人的語法之後再來看這種“叩槃、捫燭”之談，豈不成了一個大可嗤笑的穿鑿附會！像這一類的話頭充塞在歷代的經解裏不知有多少，如果我們懶得破費氣力去做一番狠狠的批判功夫，試問將如何肅清這緊緊包圍着古典的烏烟瘴氣？

五、《尚書》學中積累的問題

爲了這種種內部的糾纏再加上許多外來的糾纏，《尚書》這部書雖祇有二十八篇，約一萬六千餘字，然而我們要作出真正符合於古代事實的解釋，應該解決的或掃除的大小、直接間接的問題恐怕不止一萬六千餘個。這真可以說是一個十分複雜艱巨的工作。可是我們在這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中已經鼓起了雄心壯志，自願加強鍛鍊提高過硬的能力，達到摸清規律的地步，以利於擊破障礙，逐一闖過難關，爲我們祖國這部最古而又主要的文化遺產及其附着的各個部分作出一個批判接受而又加上新時代所給予的創造性的總結。

六、新型《尚書》解釋的開始

真正開始在語音、字形、語彙、語法等方面下手，搜羅各種古典和金、石的比較資料，創造新型的解釋的，開始於清代中葉，距今約二百年。我們這回的建設工作就是建築在這二百年來學術工作者的辛勤夯土的基地上。我們的計劃是把這些工作者的智慧集中起來，並盡量使得這些成果現代化，自己再前進一兩步。可是，歷史是一條割不斷的長流，我們爲要明瞭這些工作成果之所以可貴，就必須先行探索它的淵源以及歷代發展的情況，看出這些業績如何在極不平坦的道路上經過無數次的勘探而挖出寶藏的艱苦功夫。

七、春秋戰國時的《尚書》故和《尚書》傳

最早的《尚書》解釋萌芽於春秋、戰國時代。《國語》《周語》下記單襄公的話道：“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解》：“‘故’，故事也”。那時孔子還未出生，而單襄公會得引用《大誓》故，可見武王伐紂的《大誓》已有了《故》。《故》有兩種體裁，一種是講“故事”，另一種是講“故訓”（即訓詁）。在《周語》這段文字裏兩用第一人稱的“朕”分明是武王自謂，記的是武王的話，所以應當是屬於敘述故事的性質的。這就是說：武王克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大誓》是武王的誓師詞，而關於武王伐紂時的別的言行，史官

們也輯錄起來，跟《大誓》放在一起，稱作《大誓故》。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故”好像是“參考資料”，祇要和經文有些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的，都可以搜羅在一塊，供讀經者的參考。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人，他在《兼愛》中說：“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武王將事太山隧”應該是《周書》中的一句，而從“泰山有道”至“維予一人”記的武王向泰山神禱告之辭則是這經的《傳》，所以墨子提出“《傳》曰”一語，表示這些文字的來歷。又《尚賢中》說：“以尚賢爲政之本者，……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湯誓》是《尚書》中的一篇（這篇《湯誓》今佚），《距年》似乎是《尚書傳》中的一篇，用來解釋《湯誓》的，所以它的话跟《湯誓》大同小異。這個設想如果對頭，就可以見得，至少在墨子時已經有人爲《尚書》作《傳》（以上採用章炳麟《檢論》《尚書故言》和他的《國故論衡·明解故上》）。比墨子時代稍後的有孟子，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他雖沒有提到引用《尚書》的《傳》，可是他把“洪水”一詞來解釋《尚書》中的“洚水”，似乎那時的經師已有作了故訓式的《傳》來解釋《尚書》字義的。如果這個猜想不錯，那就下開漢代的章句一派。

八、《尚書大傳》的兩種體裁及其批判

自從秦始皇燒《詩》《書》，頒布了“挾（藏）書”的禁令，直到漢惠帝四年（前 191）開禁，在這二十三年之中，經過劇烈的內戰，《尚書》又是一部露不得面的書，不知道燒掉和爛掉了多少部竹簡，經師們當然絕大多數在慘酷的兵火中死去了。到漢文帝時（前 179—前 157）久已動盪的社會漸趨於安定，這位皇帝纔想起了這部書，可是離始皇燒書的時候已經半個世紀了，全國的《尚書》經師零落得祇剩下曾在秦朝做過博士的伏生一個人了。伏生手頭也僅存一部殘缺不全的《尚書》。經過重編，勉強湊成二十八篇（如《梓材》，分明是兩個殘篇湊成一篇的）。他那時在濟南教授《尚書》，不知道他是怎麼講的。漢代有一部《尚書大傳》留傳了下來，這部書，《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都著錄，但都沒有指出作者的姓名；只有唐初的《經典釋文》說它出於伏生的手筆（這書到宋代後亡佚，清人有輯本多種，皮錫瑞的《尚書大傳疏證》最後出，也就最完全）。無論這部書是伏生一人獨著，或漢初《尚書》經師的集體創作，總是現存的一部最早的《尚書》解釋，這部書就兼備了“故事”和“故訓”兩種體裁。它說《堯典》時，把舜的政績分年排列，又列叙了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等八伯的樂舞；它說《禹貢》時，又有東海、南海、西海和五湖的貢獻，說到《微子》，又有微子過殷故墟時所唱的《麥秀》之歌（後來這個故事送給箕子）；說到《洪範》，又有《洪範五行傳》，盡量發揮人君

的一舉一動和天降災異的緊密關係，而且有《月令》式的在每一個月裏天子所應行、應禁的事情；它說《梓材》，有周公三見伯禽而三答他的故事：這都是經文裏所沒有的事情，由它加鹽加醬地添出來的。《梓材》上半篇是赦免罪人的話，下半篇是君臣交勉之詞，根本上和周公教子不生關係，它生硬地拍合在一塊，徒然自揭了對於《周誥》的無知。這種體裁，和《韓詩外傳》的講《詩》、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講《春秋》，不多講本經而專喜歡“離題萬里”地侈陳故事的一模一樣，和唐代僧人把中國的故事演為“變文”，隨說隨唱，來吸引聽眾信仰，根本和佛經無關的也一模一樣。猜想那時候的經師所以會得寫成這一種不三不四的體裁，大概他們根本上沒有想到自己的任務應該規規矩矩地去研究經義，而只想娓娓而談，談得“像煞有介事”，使封建統治者為之瞿然動容，達到他們利用說教的方法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基業，藉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的目的，而封建統治者也就樂於利用他們的說教來達到麻痹人民減少反抗的策略。有時候，這部《大傳》也解釋些經文，但由於他們純任主觀，信口開河，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錯誤。例如《康誥》一篇，本是記錄的周公東征後封他的親弟康叔於殷的故土時所作的統馭殷民政策的一篇訓話，開頭說：“孟侯，朕其（之）弟，小子封。”這“孟侯”一詞解作“諸侯之長”本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想不到《大傳》卻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御覽》一四六引），試想康叔既不是天子的太子，天子的太子也沒有在這篇書裏出過場，那麼周公在說“朕其弟”之前先提天子的太子有什麼意義？這在《周誥》裏最容易解釋的一個名詞尚且講得這般地不通，然則詰屈聱牙的十餘篇《周誥》還能希望它講通嗎？所以清代學者們常掛在嘴上的“漢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據”的無條件的信仰，這個迷信的框框如果不打破，我們衷心希望實現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解釋就必然無法作出來！

九、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說所以分歧的原因

伏生之後經歷數傳，《尚書》一經先立於博士的是歐陽一家，在漢武帝時；繼立的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二家，在漢宣帝時。這三家各有其《章句》，又有其相互不同的《解故》和《說義》（均見《漢書·藝文志》）。為什麼伏生一家之學會得分成三家？那無非為了他們競奇立異，故意把經文的意義作出不同的解釋來炫耀自己，所以《漢書·夏侯勝傳》記載夏侯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那時他的叔父夏侯勝就批評他“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可是夏侯建也不甘示弱，他撕下面子，反過來批評他的叔父“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在這樣的吵鬧之下，皇帝也沒有抉擇誰是誰非的能力，祇得不分優劣，把他們的學說一起立於學官，聽讓他們各把自己的臆見傳授給徒弟，因此分門別派，釀成了經學史上的無休止的鬭爭。即此可知他們標榜的

“師說”原非來自集體的客觀研究，有所發明，而祇是憑着幾個敢於大膽妄為的分子閉着眼睛，發揮他們的高度唯心主義的自由創造。這祇須看《春秋穀梁傳》，它便是在《春秋公羊傳》盛行之後，有一個桀黠之徒，懷着搶立博士的目的而杜造出來的，所以有的地方偷偷地鈔襲《公羊》，有的地方則故意強詞奪理地反對《公羊》。他對於春秋時代的歷史知識十分淺薄，什麼《國語》或《左傳》他全未看到，祇會敷衍經文，大講其孔子修《春秋》的微言大義，勉勉強強的拼湊成一部新的《春秋傳》，來奪取年俸六百石的一個博士官職（例如《春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說：“‘克’之者何？殺之也”，《穀梁傳》却說：“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然則這句話翻譯出來，竟成了“鄭伯能段于鄆”，還成什麼話）。《尚書》三家博士的種種著作，現在雖已完全亡佚，我們没法抓住他們的“搶生意”的辮子，但只消把《穀梁傳》作比例，也就想得出他們的“具文飾說”的一套伎倆。我們在這兒可以講一個故事。有一個傳授小夏侯《尚書》的秦恭，字近君（一作“延君”，必有一誤），大概是最擅長附會和誇張的人。桓譚《新論》裏說他：“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漢書·藝文志》顏《注》引）。《漢書·儒林傳》也說“恭增師法至百萬言”。他沒有得到新發現的資料，為什麼他的注解會寫得這般地繁富呢？班固一句話就點穿了他，“蓋祿利之路然也”；顏師古的《注》又補上一句：“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原來這種海闊天空的經說，表面上雖然裝得堂皇冠冕，可是它的內容却很空虛，正像宋代以下的八股文，每個讀書人都會“代聖人立言”，上天下地，講出一套，他們在幾百年時間中寫出了數以億計的文章，用來作為爬上官吏地位的敲門磚，但到科舉一停，就立刻煙消雲散了。為什麼？就因為它是完全脫離客觀實際的夢幻、泡影，不能增高人類的智識水平的。所以漢人經說的散亡，雖然使得我們没法認識漢代經學的全貌，但它如果完全保存了下來，它將隨處在經書的本身研究上起着劇烈的干擾作用，使得我們如在荊棘叢中走路，扯破了衣服、刺傷了手足不必說，結果則所得到的實在的東西必然祇限於漢人的神秘離奇的思想。所以這些東西的散亡正同失掉堆積如山的八股文一樣，沒有什麼可惜。現在我見是得到的漢代今文家的《尚書》解釋，已統給清陳喬樞的《今文尚書經說考》和《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輯集起來，窺豹一斑，便知全體。《大誥》一篇，為了有王莽的模仿作品《大誥》存在，它保存了比較完整的今文說，我們想，讀了他這篇文章，西漢今文家的《尚書》解釋的面貌和神情，就都不難得到一個相當深刻的印象了。

一〇、漢初孔氏家藏的書傳

今文家如此多歧，已是麻煩得人們頭昏腦脹。古文家呢，那就更為複雜，複雜到二千年

來從沒有人能給予它清算的地步。但到了今天，我們知道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該去下手工作，爲了要把古代的家派問題弄個明白，使得《尚書》的解釋問題也跟着得個分曉，所以我們就耐心地替它整理出一個大體的頭緒來。

首先記載《古文尚書》這件事的是《史記·儒林傳》。這上寫道：“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今文”作“今文字”）。這是說孔子的老家藏有用古文字書寫的尚書，孔子的子孫孔安國（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用了漢代通行的隸書把它轉寫一遍，結果比伏生本多出了“十餘篇”，因此孔安國在《尚書》學中就自成爲一個家派，可是這部用今文字移寫的《古文尚書》在當時却没有發生什麼影響，連這十餘篇《逸書》的題目也不曾傳下來。至於這部《古文尚書》有沒有《傳》呢？這就成爲一個長期辨論的問題。考司馬遷在《孔子世家》裏說：“孔子……故所居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這是說孔子的故居，後世把它改成了廟，把孔子的遺物都藏在那裏，書籍是遺物中的一部分，它並沒有經過秦始皇的焚毀，也沒有在楚、漢之際的戰爭裏消滅；直到漢武帝時，司馬遷旅行到魯，還曾參觀過這座紀念館，所以孔氏有《古文尚書》這件事是無庸懷疑的（這個孔廟，到《漢書》裏便變成了“孔壁”，說是魯恭王築宮時拆開孔家的墻壁所得，見下）。《孔子世家》又說：“孔子之時，……《詩》、《書》缺。……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終秦繆（秦穆公）”，又說：“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兩次提到“書傳”，似乎孔子傳下來的書籍之中確有解釋《尚書》的《傳》。要解決這個問題，先須看一下古代的書籍制度。按鄭玄《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儀禮·聘禮》賈《疏》引。王應麟說：“‘謙’，當讀爲‘減’”）。《論語·學而》：“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爲‘專’”（《釋文》引），《說文·寸部》：“‘專’，六寸簿也”。根據上面這些資料，可見簡策的長度有漢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數種。六經地位尊崇，是必讀的教科書，所以用最長的簡來寫它（《孝經》雖也是教科書，但它不是先王的政典，所以較短）；傳、記之類，是讀經時的參考書，可備可不備，所以用些短簡來寫它，等於現在說的“袖珍本”或“小冊子”。“書傳”和“禮記”兩名，正確的標點應當是“《書》、《傳》”和“《禮》、《記》”，換句話說，就是《尚書》連同它的《傳》、《禮經》（即《儀禮》）連同它的《記》；也就是說教科書連同它的參考書。《尚書》在春秋、戰國之間已有《故》有《傳》，那麼孔家所藏的《尚書》，長簡的《經》和短簡的《傳》並存，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情（黃侃曾指出，《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以別九州……’”一段文字不是《夏書》的《經文》而是《夏書》的《傳文》，見章炳麟《明解故上》，章氏接着說：“要之，《書傳》素多族類，自孔子時已有數種，孔安國所以無記錄者，以其故《傳》具在”）。孔安國用了今

文字把這部《古文尚書》轉寫一遍是有記錄的，至於他如何處理這些短簡的《傳》，則《史記》和《漢書》中都沒有字說及。至於孔安國自己有沒有作過解釋《尚書》的《傳》，這一事更絕不見於當時的記錄。《漢書·藝文志》中《尚書》類有“《傳》四十一篇”，那即是今文家歐陽、夏侯等所共有的《尚書大傳》，不是古文家的《傳》，料想司馬遷所說的孔家原有的《書傳》，在劉向父子為漢成帝、哀帝校書之前就早歸亡佚了。

一一、所謂孔安國作的《傳》、《注》的牴牾

可是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其家”之後，他即成為古文學派的開山祖師，聲名廣遠，他雖沒有編過《傳》，作過《傳》，但後來的古文學派是永遠放不了他的，所以自從有了《偽古文尚書》之後，就有了所謂孔安國的《尚書傳》。他不但著了《尚書傳》，而且還著了《孝經傳》和《論語注》。這些所謂孔安國的新著作，因為真正的作者不是同一人，他們沒有作過相互對勘的工作，所以他們的見解就不免參差不齊。就像上面《墨子》所引的“武王將事太山隧”的《傳》，“雖有周親，不若仁人”這句話，既見於《論語·堯曰》，又見於《偽古文尚書》《泰誓中》。在《堯曰》裏的孔安國《注》是“‘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何晏《論語集解》引），照這說，“周親”是周家的親戚，和殷家的“仁人”相對，“周”字應加上專名標號。可是在《泰誓》裏的孔安國《傳》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若周家之少仁人”，那麼，“周親”又變作商紂的至親，“周”成為“親”的形容詞，不該加專名標號，“仁人”則轉到了周家一邊來了。如果孔安國真是這些書的作者，難道他竟患了精神分裂症，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來？這種矛盾顯而易見，姑且按下不表。

一二、《史記》中的《尚書》說和今、古文經學是否有關

最能搖惑人視聽的，是所謂孔安國的“古文說”。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裏寫道：“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這一句話見得孔安國雖沒有做過《古文尚書》的傳注，却自有其不同於今文家的“古文說”存在。這是不是確有其事呢？我們可以取出史記來作一回檢查。第一，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裏詳記了他自己的生平，他問《春秋》於董仲舒是寫出來的，可是並不見有問《尚書》於孔安國的事。“古文”這個名詞是有的，如《十二諸侯年表》中“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自序》中“年十歲則誦古文”都是。可是這“古文”祇泛指一般古書而言，所以司馬貞《索隱》說：“劉氏（唐劉伯莊）以為《左傳》、《國語》、《系（世）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可見這決不是指的《古文尚

書》。如果司馬遷確實向孔安國學過《尚書》，那麼孔氏本《逸書》十餘篇原是絕好的古代史資料，為什麼他作《史記》時只鈔進今文家所有的幾篇，把這十餘篇《逸書》輕輕地放過了（《殷本紀》中的《湯征》、《湯誥》不出於孔安國本，見下）？第二，司馬遷把《堯典》鈔入《五帝本紀》時，改“寅賓出日”為“敬道（導）日出”，改“疇咨若予采”為“誰可順此事”；把《皋陶謨》、《禹貢》鈔入《夏本紀》時，改“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為“百吏肅謹”，改“降丘宅土”為“下丘居土”；把《金縢》鈔入《魯世家》時，改“遘厲虐疾”為“勤勞阻疾”；把《微子》、《洪範》鈔入《宋世家》時，改“咈其耆長”為“不用老長”，改“彝倫攸叙”為“常倫所序”；這原是因為他用了西漢時代通行的文言體裁來寫書，而《尚書》中的古字奧義不易為當時的一般人所瞭解和接受，所以他就譯作常言以期普及，也希望在全部《史記》文字裏不致有太不調和的氣氛。試問這些譯文和《古文尚書》有什麼一定的聯繫？跟孔安國這個人和他的學說又有什麼一定的關係？而且司馬遷作出的譯文，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恰當。即如“遘厲虐疾”一語，本是說周武王犯了重病，“厲虐”是“疾”的形容詞，“遘”義為遭逢，是動詞，文義極為明白；可是他譯為“勤勞阻疾”則是武王因勤勞而得了纏綿的病（《集解》引徐廣說：“‘阻’一作‘淹’”，義為浸漬），“阻”作為動詞，“勤勞”是“阻”的副詞，這何曾合於《金縢》原文的意義。即此可以看出，司馬遷把《尚書》通俗化，他的工作態度絕不嚴肅；至於那些難讀的殷《盤》、《周誥》，他祇是一筆帶過，或敷衍些和原文不相干的門面話；甚至《多士》、《無逸》兩篇，周公各有其說話的對象，可是司馬遷在《周本紀》裏說：“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逸）”，好像這兩篇都是對殷遺民說的，而在《魯世家》裏却說：“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無）逸》”，又好像這兩篇都是對成王說的。他進退無據，這樣地既不合邏輯又違背歷史事實的說話，又證明了他對於《尚書》一經沒有做過深刻的研究，懂得的實在很少。所以，凡是《史記》中的《尚書》異文，祇可以說在司馬遷的理解下是如此的，而決不可以推斷為司馬遷在《今文尚書》以外另據有《古文尚書》的本子和孔安國的《尚書》古文說。清代學者為了不明白這一點，而惟墨守《漢書》的單文孤證，因此，他們分析漢代的今、古文時常常把《史記》引用《尚書》的文字和解釋異於今文的都看作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時所接受的師說，如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和章炳麟的《太史公古文尚書說》便是；或者認為《史記》雖大體上用的是今文本和今文說，而間亦采用孔安國的古文說，如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便是。他們不知道，這些異同僅僅表示司馬遷個人的意見，司馬遷祇是一個史學家而不是經學家，他的說法是可以擺脫今、古文家派的束縛的。至於班固為什麼會得貿然作出“司馬遷問故於孔安國、《史記》中多古文說”的結論，那是因為在他作《漢書》的時候，東漢建國已五十年了，那時古文經學正以帝皇和大臣們的提倡，雖不立學官而在民間極為風行，古文學派有攀附名人為自己壯大聲勢的要求，所以虛構了這一說作宣傳，“固七侗而願”（龔自珍語），以為真是這樣，就輕易信從，

筆之於書了。

一三、所謂《中古文尚書》和孔壁《尚書》

第二部《古文尚書》見於《漢書·藝文志》。這上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這部《古文尚書》因為藏在皇宮裏，所以稱為“中古文”。和這部書有同樣情形的是《周易》，《藝文志》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照這所說，中古文經在經典的校勘方面大有用處。王充《論衡·正說》篇也說到這部書，他道：“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他扣定這部《中古文尚書》是孔壁所藏的完整的百篇本，沒有經過孔安國的“今文讀”，而當時也沒有人能讀，所以藏在中祕，不曾立於博士。按漢元帝（前48——前33）、成帝（前32——前8）之世極崇儒學，通鐘鼎文字的前有張敞，後有揚雄、甄豐，古文經典已不是絕對讀不通的東西。如果絕對讀不通，劉向又如何能校？可是，如果中祕真有這樣的好本子，又經劉向校過，證明它確實勝過三家，當然應該立於博士，至少也該據以改正博士本的闕漏，為什麼祇有《七略》（《藝文志》的底本）中極簡單地一叙，就沒有下文了呢？因此，龔自珍在他的《說中古文》中說：“中祕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亦不傳受一人，斯為空前，斯為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這曇花一現的所謂全本《古文尚書》確實有它的可疑之點，龔自珍的揭發是有他的理由的。

一四、張霸的《百兩篇》及其疑問

第三部《古文尚書》也在漢成帝時出現。《漢書·儒林傳》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應作‘今’）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即《中古文尚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顏《注》：“以霸私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論衡·正說篇》也說：“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應作‘萊’）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即《中古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